

理性、正义与城邦：柏拉图双文本的哲学考察

徐文俊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5月25日；录用日期：2026年6月17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30日

摘要

本文旨在深入考察柏拉图哲学中两种核心精神形态——“哲学王”所依据的至善知识(Episteme)与苏格拉底所恪守的“无知之知”(Aporia)——之间的内在张力与深刻互补关系。文章并非将二者视为理论断裂，而是揭示其为哲人面对超验理念与城邦现实时所展现的“理论理性”与“实践智慧”的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上，《理想国》通过“善的理念”的形而上学奠基，构建了正义的本原性解释框架，指出正义的合法性并非源于契约或强权，而是源于存在秩序本身的合目的性结构。然而，这种完美的理论建构在现实政治中遭遇了严峻挑战，《苏格拉底的申辩》深刻揭示了哲学省察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冲突，以及哲学批判与城邦礼法的永恒矛盾。研究表明，从“善的理念”的理性建构到“无知之知”的现实辩护，柏拉图哲学展现了哲人与城邦之间既追求统一又充满张力的复杂辩证关系。在当代工具理性泛滥与价值多元的语境下，重新审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对于我们理解灵魂省察的自由的边界以及重建公共生活的伦理规范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关键词

柏拉图，《理想国》，《苏格拉底的申辩》，善的理念，正义，灵魂省察的自由

Reason, Justice, and the City: A Philosophical Look at Plato's Two Texts

Wenjun Xu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y 25, 2026; accepted: June 17, 2026; published: June 30, 2026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duct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wo core spiritual forms in Platonic philosophy—the knowledge of the ultimate good (Episteme) upon which the “philosopher-king” relies and the “knowledge of ignorance” (Aporia) adhered to by Socrates—focusing on the intrinsic tension

and profou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paper does not treat them as theoretical ruptures but rather reveals their dialectical unity as “theoretical reason” and “practical wisdom” demonstrated by the philosopher when confronting transcendental ideals and the realities of the polis. On this basis, the *Republic* establishes a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through the “Form of the Good”, constructing a fundamental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justice, indicating that the legitimacy of justice does not stem from contracts or coercive power but from the purposive structure inherent in the very order of existence. However, this perfect theoretical construct encounters severe challenges in practical politics; *Apology of Socrates* profoundly reveals the conflict between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and public morality, as well as the eternal tension between philosophical critique and the law of the polis. Research shows that from the 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Form of the Good” to the pragmatic defense of the “knowledge of ignorance”, Platonic philosophy demonstrates the complex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polis, one that seeks unity yet is full of tens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rampant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plural values, re-examining Plato’s political philosophy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underst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freedom of soul-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ng ethical norms for public life.

Keywords

Plato, *Republic*, *Apology of Socrates*, Idea of the Good, Justice, The Freedom of Soul Refle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柏拉图的哲学处于古希腊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危机之中。当时的智者，如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相对主义观点使得真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受到极大挑战。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柏拉图试图寻找超越感官经验的真理和知识，并建立起超验的认识论基础。通过构建灵魂回忆说与辩证法，柏拉图不仅为知识的来源提供了解释，还为政治和道德的理念提供了理论基础。如果真理仅仅是主观意见的汇总，那么城邦的正义便无可避免地沦为强者的利益(如特拉聚马霍斯所言)或民众意见的专断。面对这一城邦秩序解体的深层困境，柏拉图并未将哲学思辨局限于纯粹的理论建构，而是试图在变动的城邦现实中寻找永恒的正义秩序。

柏拉图的哲学体系构建了一种独特的超验认识论，其核心在于确认真理并非外求于经验世界，而是内在于灵魂的深层结构之中。正如丁豪在研究中指出的，柏拉图在《美诺篇》与《斐多篇》中构建的“灵魂回忆说”与“辩证法”这双重认识论路径，成功地为真理的追寻提供了先天根基与系统方法[1]。这种理论建构在《理想国》中达到了顶峰，柏拉图通过“善的理念”为城邦正义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奠基，将正义从社会契约或强权政治的漩涡中拯救出来，赋予其宇宙论秩序的意义。

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曾深刻指出，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即是“哲人与城邦的关系”[2]。本文的核心任务并非平行叙述这两部作品，而是将它们置于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统一问题域中：若《理想国》中“哲学王”统治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他对“善的理念”这一终极知识的洞见之上[3]，那么，《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以“无知之知”为基础的终身省察，究竟是对这一知识模型的否定，还是它得以实现的实践前提？通过聚焦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将论证，“知识”与“无知”共同构成了柏拉图政治哲学硬币的两面，其中，理论性的至善洞见为城邦秩序提供了先验的正当性根基，而实践

性的“无知”省察则为哲学在现实城邦中的存在开辟了批判性的空间。柏拉图的哲学至今仍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深远影响。在当代，尤其是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许多价值观念变得模糊和多元。柏拉图关于真理、正义和灵魂省察的自由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哲学资源。当前，思辨哲学和政治哲学面临许多现实挑战，柏拉图的理想城邦模式和哲学教育理念为当代社会的伦理重建和灵魂省察的自由的边界设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 认识论基础：灵魂回忆与辩证法的真理追寻

在探讨城邦正义之前，必须首先确立知识的合法性来源。针对智者派的经验相对主义困境，柏拉图在《美诺篇》与《斐多篇》中构建了独特的双重认识论路径——通过灵魂回忆说与辩证法的协同运作，确证了知识的先天性根基，并提供了获取真理的方法论保障。

2.1. 灵魂回忆说与知识的先天性

柏拉图灵魂回忆说为知识的先天性提供了坚实基础。在《美诺篇》和《斐多篇》中，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的对话展示了灵魂如何通过回忆来获取真知。这一理论不仅反驳了经验主义的观点，还为知识的客观性提供了支持。通过苏格拉底对未受教育的奴隶进行启发式提问，柏拉图证明了知识并非源于感官经验，而是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先天记忆。柏拉图的核心命题在于：真正的知识并非经验世界的被动摹写，而是灵魂对理念世界的主动回忆。这一革命性观点在《美诺篇》的奴隶实验中获得经典展现。苏格拉底通过一系列启发性提问，引导一个未受教育的奴隶少年逐步推导出“倍面积正方形边长”的几何命题。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真理并非从外部植入，而是通过理性推理，灵魂从模糊的意见(δόξα)上升为清晰的知识(ἐπιστήμη)。柏拉图借此证明，学习不过是回忆，知识早已潜藏于灵魂深处。

在《斐多篇》中，柏拉图进一步明确批判了感知经验的不可靠性。他指出，感官所把握的只是流变的表象，如“相等的木棒”与“相等本身”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本体论鸿沟。真正的知识，如“绝对相等”、“绝对美”等理念，必须通过理性(νοῦς)才能触及。回忆说不仅是对知识来源的解释，更是对灵魂不朽的证明：若真理先于经验存在，则认知主体必然在生前已持有这些真理，并在与肉体的结合中暂时遗忘，再通过辩证法的引导重新觉醒。这种对知识先验性的确立，为后文建构超越经验主义的绝对正义观排除了干扰。

2.2. 辩证法：从意见到真理的上升之路

柏拉图的辩证法不仅是一种理论方法，更是认识论的实践工具。在《理想国》以及其他对话中，辩证法通过连续的对话和反思，逐步揭示真理的多维性。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概念，强调哲学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是对内在思想的深刻审视。在《会饮篇》中，苏格拉底通过一系列反讽和提问，揭示了对话者思想中的矛盾，并通过批判性思维帮助其达到对“爱”的深层理解。回忆说从本体论层面解决了知识的来源问题，而辩证法则从方法论层面提供了激活这种潜在知识的认知工具。丁豪在其研究中精辟地指出，回忆说与辩证法共同构成了柏拉图先验理性主义的完整体系，二者在通达理念世界这一终极目标上实现了深刻的统一[1]。

在《理想国》第七卷的洞穴寓言中，柏拉图通过囚徒逐步转向光明的过程，形象地展现了辩证法作为教育实践的本质特征。这个上升过程是从洞穴墙壁上的阴影到火光映照的器物，再到洞外的自然事物，最终直视太阳本身。每个阶段的过渡都伴随着剧烈的认知冲突与痛苦适应，暗示着辩证教育必然包含的否定性环节，即苏格拉底式的反诘法(ἐλεγχος)对既有意见的瓦解。在辩证的最终阶段，善的理念作为最高认知阶段的象征，不仅是最真实的认识对象，更是使一切认知成为可能的终极条件。辩证法由此成为灵魂转向(ψυχῆς περιαγωγή)的技艺，引导灵魂从流变的现象世界上升到永恒的理念世界。

3. 伦理与政治的形上奠基：善的理念与正义

在确立了认识论基础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试图为城邦的政治伦理结构寻找终极依据，即通过善的理念为正义进行形而上学奠基。如果缺乏这种形上奠基，城邦的法律和秩序就只能建立在脆弱的习俗或强权之上，这正是智者派所暴露的困境。

3.1. 正义定义的经验困境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通过“善的理念”将正义与宇宙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第四卷中，苏格拉底通过比喻和逻辑推理指出，正义并非简单的社会契约或个人心理平衡，而是依赖于“善的理念”这一更高层次的存在原理。在柏拉图的世界中，“善”是所有理念的最终依据，是理性和道德行为的源泉。正义通过与善的理念的结合，赋予了城邦及个体生命的目的性。《理想国》第四卷中，苏格拉底将城邦正义定义为“每个公民只从事合乎其天性的职业”，即各司其职；将灵魂正义归结为理性、激情与欲望三部分的“内在和谐”[3]。然而，正如丁豪在其对《理想国》的形而上学解读中所指出的，这种经验层面的定义存在循环论证困境：用分工来定义正义，却又用正义来证明分工的合理性；将和谐状态直接认定为善，却没有说明和谐为何必然具有价值[4]。在缺乏形上学根基的情况下，经验层面的正义定义无法自证其合法性，随时可能被智者的强权逻辑所击穿。

3.2. 善的理念作为终极本原

面对第四卷的论证困境，柏拉图在第六卷开启了形上学转向，明确指出正义和其他美德唯有与善的理念结合，才能成为有用且有益之物。然而，对“线段比喻”（《理想国》509d~511e）的文本细读会揭示一个更为复杂的情况。柏拉图将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再次切分为二，形成了一个从“影像”、“实物”到“数学对象”、“理念”的等级序列[3]。关键在于第四层级的认知方式——“辩证法的逻各斯”，它不再依赖任何感性假设，而直接以理念本身为阶梯，最终上升至“万有的本原”。此处的文本精妙之处在于，当灵魂达到对“善的理念”的纯粹理性直观时，任何命题性的“知识”表述都将失效，因为作为一切存在与认知终极条件的“善”，本身已超越了任何“是什么”的定义框架。正如丁豪所指出的，善是使认知成为可能的终极条件，但柏拉图并未让苏格拉底直接断言“什么是善”，而是通过“阳光喻”进行类比[4]。这种在终极本原面前的“沉默”与“类比”，在结构上恰恰映射了《申辩》中苏格拉底的“无知”。它暗示，哲人王所拥有的最高“知识”，可能不是一套可供传授的教条体系，而是一种灵魂转向后的超越性澄明状态，这一状态在介入城邦的“洞穴”时，必然以其否定形态——对一切伪知识的解构——作为其实践的开端。在目的论视野下，善的理念既是万物趋向的目标，也是万物存在的内在形式。这意味着，正义并不是人类为了功利而达成的社会契约，而是对宇宙内在合目的性秩序的客观摹仿。正如徐雁宇所言，《理想国》中的正义是真与善的同一，善的理念赋予了正义以价值指向[5]。

3.3. 从形上秩序到政治正义的实践转化

形上学的建构最终需要落实到人类的具体实践中。灵魂通过辩证法的训练逐渐摆脱感性束缚，获得观照宇宙秩序的能力，并在自身内部重构相应的秩序结构。灵魂与城邦的类比关系为形上秩序向政治实践的转化提供了方法论桥梁：当多个已经实现内在和谐的个体组成共同体时，城邦正义就自然显现为各阶层的协调运作。哲学治理者（哲人王）的统治本质上是一种“中介性”实践：他既把握了善的理念，又懂得如何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安排。这种转化表明，理想的政治秩序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想，而是对永恒秩序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摹仿。

对柏拉图形而上学的批评也为其思想的深化提供了视角。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

认为理念世界过于抽象，难以与感性世界的现实存在建立直接联系。然而，这一批判并未削弱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框架，反而促进了后续哲学家对形式与物质关系的进一步思考。此外，现代哲学如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提供了对柏拉图理想化政治哲学的不同视角，尤其是在个体自由与集体秩序的关系方面。

4. 哲人与城邦的现实张力：灵魂省察的自由与政治秩序的结构性冲突

柏拉图的“哲人王”模型不仅是《理想国》的核心思想，也是他对理想政治形态的设想。根据柏拉图的设想，理想的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他们通过对理念世界的理解，确保城邦遵循正义。然而，这一理论在现实中面临巨大挑战。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如何在保障个体自由的前提下，建立有效的政府形式，是柏拉图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通过对比当代政治思想家如约翰·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理论，探讨柏拉图的理想模型与现代民主理论的异同。尽管《理想国》在纯粹理论的维度上，通过“哲人王”的构想实现了形上本原与经验实践的完美弥合，但在现实历史中，哲学思考与政治共同体之间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指出的，城邦的本质在于其封闭性与特定的政治神学，而哲学的本质在于对整全的开放性追问。这一现实张力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得到了最集中的悲剧性展现。

4.1. 认识论解构与“不敬神”的政治实质

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通过自我辩护展现了哲学与城邦规范之间的深刻冲突。苏格拉底坚持“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这意味着哲学思考的核心在于不断质疑和探索，而这与雅典城邦的政治秩序发生了冲突。雅典的法律和道德规范要求公民遵循社会的传统和权威，而苏格拉底则通过批判性思维挑战这些传统，特别是在对知识的定义和对公共道德的理解方面。苏格拉底在法庭上首要面对的是“不敬城邦之神”与“引进新神”的具体指控[6]。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场关乎城邦信仰的审判，但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语境中，这实质上是根本的认识论与政治权威之争。雅典城邦的法律和秩序建立在对神话和传统的无条件信仰之上，政治家与诗人们垄断了这种知识的解释权。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命题构成了对这一传统知识体系的彻底解构。他通过理性的辩证方法诠释德尔斐神谕，将神启转化为了哲学探究的起点，实际上剥夺了城邦信仰的神圣帷幕。这种坚持开放性真理探索的辩证方法，与城邦追求确定性价值观传承的传统体制产生了无法调和的裂痕。

4.2. 伦理学的内化与公共道德的解体危机

个体省察与公共道德之间存在着更为深刻的伦理学对立。城邦的德性建立在外在的习俗(νόμος)和法律服从之上，是一种维护共同体同质性的行为规范；而苏格拉底却坚持“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将道德判断的标准彻底内化为个体的理性审查[2]。对苏格拉底而言，德性首先是灵魂的内在状态，是通过哲学省察达到的精神境界。这种伦理学的内化意味着，公民的第一忠诚不再是城邦的成文法，而是个体的理性与良知。当个体将理性置于政治忠诚之上时，不可避免地会被城邦视为一种“败坏青年”的危险力量，因为它从根本上瓦解了城邦对公民灵魂的绝对管辖权。

4.3. “牛虻”隐喻下的哲人与城邦的固有矛盾：批判与服从

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神赐予城邦的“牛虻”，这一意象深刻展现了哲学与政治的永恒悖论：城邦的健康与活力需要哲学这只“牛虻”的刺痛以防止其陷入教条与腐败；然而，城邦的政治本能却驱使它拍死这只牛虻以维护暂时的稳定与统一[6]。城邦礼法要求的是公民的服从和思想的统一，而哲学思考则要求绝对的自由与无条件的质疑。苏格拉底之死揭示了，即使在雅典民主制的最鼎盛时期，灵魂省察的自由的实现也面临着残酷的制度约束。哲人必须介入政治生活进行批判，但这种批判往往以哲人的牺牲为

代价，这不仅是古希腊的特有现象，更是灵魂省察的自由与城邦秩序之间永恒的平衡难题。

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特别是通过辩证法启发思考的方式，体现了哲学与政治的张力。柏拉图通过对苏格拉底审判的叙述，揭示了一个深层的哲学问题：教育和灵魂省察的自由是否应当受到政治权力的限制？这种张力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如何平衡公共教育、政治自由和个体权利之间的关系方面。

5. 理论回响：“哲学王”与“苏格拉底”的现代变奏

与其将柏拉图的洞见直接应用于当代，不如以其作为概念工具，剖析现代政治思想面临的结构性困难。本章将以现代社会中关于“技术治理”与“公民不服从”的讨论为例，展示柏拉图式思维框架的分析潜力。

5.1. “洞穴”的技术化：专家知识与理性省察的张力

当今社会依赖的大数据算法与专家系统，构建了一个高度精细的现代“洞穴”。这些系统声称掌握了关于社会运行的确定性“知识”，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治理，这无疑是“哲学王”理念的技术化变体。然而，根据《申辩》的逻辑，任何声称对“人的完善”拥有终极知识的封闭体系，都值得以“无知之知”进行审视。苏格拉底的“牛虻”角色，在此转化为对那些不透明的、声称价值中立的算法黑箱的持续追问：它依据何种“善”的理念进行决策？其逻辑链条是否经得起公共理性的辩证检验？这种追问并非全盘否定专家知识，而是揭示，脱离了对自身局限性的“无知”式警惕，技术治理极易从“科学”异化为新的未经省察的“意见”（δόξα），进而固化新的不义。

5.2. “牛虻”的使命：个体良知与城邦礼法的永恒叩问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申辩，他对神的侍奉高于对雅典民众的服从[6]。这提出了一个根本的伦理-政治难题：当个体通过深刻的理性省察，发现城邦的礼法(νόμος)本身偏离了正义的轨道时，他应如何行动？这并非简单的叛逆，而是灵魂内在秩序与城邦外在秩序的根本冲突。柏拉图的《克里同篇》虽展现了苏格拉底对城邦法律的最终服从，但他在《申辩》中的申辩过程本身，已构成一种典范性的行动：以言辞为武器，通过理性的辩证法公开检验城邦礼法的正当性根基。这种在行动上服从，在言辞上永不妥协地进行灵魂省察的姿态，为后世思考个体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伦理责任，提供了一个比任何形式都无法捕捉的范式。它表明，真正的共同体稳定，并非源于个体对所谓“城邦礼法”的沉默与划一，而是建立在那些拥有“内在和谐”灵魂的公民，持续不断地以理性检验并重塑城邦共同善的动态平衡之上。

6. 结论

柏拉图哲学展现了一个从理论建构到现实反思的宏大演进过程。从《美诺篇》和《斐多篇》中对知识先天性的确证，到《理想国》中以善的理念为核心的宇宙秩序论构建，柏拉图在理论层面完美解决了理性、知识与正义的奠基问题。他通过将正义回溯至善的理念，成功地为伦理和政治秩序找到了一个超越经验、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根基，从而在理论上战胜了智者派的相对主义。

孙磊指出，苏格拉底之死揭示了哲人追求真理的无条件性与现实政治秩序之间的永恒张力[7]。《苏格拉底的申辩》作为历史的倒影，说明了这种张力。这种张力根源于哲学与城邦在本质上的差异：哲学追求的是超越时空的真理，而城邦需要的是维护自身同一性的确定信仰。苏格拉底之死并非哲学思考的失败，而是其本质的彰显——它证明了哲人在任何时代都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

柏拉图的哲学遗产不仅在于其构建的先验理性主义体系，更在于他通过苏格拉底的法庭申辩，向后

世提出了一个永恒的叩问：当工具理性与建制化权威日益膨胀时，人类应如何保持独立思考的灵魂省察的自由，并以哲学的反思精神重塑现实的伦理与政治秩序。刘铁芳认为，苏格拉底的申辩本质上是对哲学教育正当性的辩护[8]。在当今价值多元、事实与意见界限日益模糊的现代社会，回归苏格拉底式的“概念检验”与理性省察，并以“善的理念”作为超越相对主义的目的论锚点，至今仍是现代哲学教育与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柏拉图的哲学为西方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正义、知识和政治伦理方面。通过重新审视柏拉图的哲学，我们不仅可以理解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还能更好地探索现代社会中的伦理危机和政治困境。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柏拉图的思想提供了反思现代社会秩序与自由的理论框架。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柏拉图哲学在后现代语境下的适用性，特别是在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背景下，如何理解其对正义和政治伦理的普遍性，以及柏拉图理想中的“哲人王”是否能在现代政治中找到对应的模式。

参考文献

- [1] 丁豪. 柏拉图认识论的双重路径——灵魂回忆说与辩证法的真理追寻[J]. 哲学进展, 2025, 14(7): 58-64.
- [2] Strauss, L. (1964) *The City and Man*. Rand McNally.
- [3]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4] 丁豪. 善的理念与正义的奠基关系——柏拉图《理想国》的形而上学解读[J]. 哲学进展, 2025, 14(8): 15-19.
- [5] 徐雁宇. 《理想国》的正义: 真与善的同一性[J]. 才智, 2011(12): 212-213.
- [6] 柏拉图. 柏拉图对话集[M]. 王太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7] 孙磊. 哲人与城邦——重新思考苏格拉底之死问题[J]. 现代哲学, 2013(2): 57-62.
- [8] 刘铁芳. 为哲学教育而辩: 《苏格拉底的申辩》释义[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1, 9(3): 158-171.